

全球化与中东社会思潮研究

编者按 这组论文是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王铁铮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化与中东社会思潮研究”的第三批阶段性研究成果。下列3篇文章分别选择以色列、埃及和土耳其为研究对象，以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为背景，深入探讨冷战结束后中东国家社会和政治嬗变的基本特点、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互动关系，从而展示出新时期中东国家变革发展的新动向。

后犹太复国主义评析

王铁铮

内容提要 后犹太复国主义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中东政局发生空前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在以色列犹太社会中出现的一种新思潮。它依据“新史学家”对大量档案文件和相关史料的深层研究，并联系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和以色列的现状，从该国国家性质和发展朝向等诸多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批判性的观点。但它尚不具备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此思潮的支持者主要为犹太左翼力量和身处犹太社会边缘的阶层，因而它自身的力量还十分脆弱，并未动摇传统和极端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现政府决策中的霸主地位。其价值在于，它对未来以色列政治的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

关键词 以色列 后犹太复国主义 思潮

作者简介 王铁铮，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9）。

20世纪80~90年代，伴随两极格局崩溃和东西方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与此同时，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又引发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重大调整与变革。在国际“热点”频发的中东地区，海湾战争结束和西班牙马德里中东和平国际会议召开为地区局势朝着缓和方向的转换营造了一种空前的和平氛围，且由此启动了作为阿以冲突标志性转折的中东和平进程。

面对国际和地区局势的新变化，在以色列，一些人开始更理性地重新审视和反思诸如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国家的目标、特征及其未来，阿以冲突和以色列犹太多数派同阿拉伯少数派的关系等问题，并力图探寻出一种更符合历史原貌的客观诠释。在涉及上述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大辩论中，在以色列学术界，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新思潮初露端倪，并立刻在以色列犹太社会产生强烈反响。这一思潮便是后犹太复国主义。其倡导者主要是以色列国内的一群颇具政治头脑和思维敏捷的年轻学者，他们的领军人物为本·古里安大学的本尼·摩里斯（Benny Morris）教授和海法

大学的艾兰·佩普 (Ilan Pappé) 博士。还有一批新近崭露头角的“新史学家”。后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对大量焦点性的档案、文件和相关史料的深层研究,并联系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发展轨迹和以色列现状,从该国国家性质和发展朝向、舆论宣传和国民教育、以色列阿拉伯少数派的公民权利、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以及以巴冲突等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批判性的观点。

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主张

(一)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分野

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意识形态和思想流派的视角将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划分为三大派,即传统犹太复国主义、新犹太复国主义和后犹太复国主义。¹艾兰·佩普认为,在这三大思想流派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犹太复国主义,主要为工党和利库德集团所属,它自以色列建国伊始便在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主流理论而存在。新犹太复国主义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极端化诠释,它是正统派拉比与极端民族主义定居者之间不稳定的联盟,并得到犹太精神领袖的支持,这一派别的成员多来自以色列的右翼或极右翼党派。该派别竭力将犹太宗教和民族主义作为防止以色列分化或分散的粘合剂,且断言建立一个民族的和宗教的神权政体是解决以色列面临的内外问题的最佳选择。后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过渡阶段的一种犹太现象,它力图对以色列的未来做出一种诠释。该派别主张,以色列应形成一种公民身份,形成一种旨在适应自由民主的普遍价值标准的制度框架。任何民族在实质上及制度上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同时,它对以色列现今构成的国家合法性不予认同。坚信以色列必须在民主性或犹太性两者之间选择。它还强调,应接受以色列支离破碎的现实,来昭示有必要把以色列变成所有居民的国家,而不是牺牲其他集团的认同感来彰显单一集团的认同感。

后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在以色列犹太社会和政坛长期扮演主角的传统犹太复国主义是历届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主要政策和计划的基石,其政治中心和专业精英们正是通过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来审视以巴问题的。而且,它也是“当时在奥斯陆的以色列和平建筑师构建和平的思想基础”^④。但在后冷战时代,传统犹太复国主义面临各方的挑战,其中主要的挑战来自右翼,因为右翼的观点是一种对犹太复国主义极端的和暴戾的阐释,它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边缘替代方案存在于利库德和修正主义派别中,盛行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教育中心。故此,传统犹太复国主义正在通过一场“自救手术”,以便把犹太复国主义从右翼的新犹太复国主义和左翼的后犹太复国主义两个敌手的夹击中拯救出来,而“自救手术”是在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名义下实施的。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称其“自救手术”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民族运动,它将带给土著的巴勒斯坦人进步和现代化,让沙漠焕发生机,重建毁坏的城市,引入现代农业和工业,并惠及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所有民众。^(四)

(二) 对以色列历史阐释的质疑和反思

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性观点涉及对以色列历史的基本看法。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一批“新史学家”在以色列学术界异军突起。他们通过对大量焦点性档案文献史料的研究和甄别,同时走访了一些至今仍健在的曾经历过1948年前后许多事件的目击者和当事人,随后完成并发表了一批著述。这些著述真实地披露了大量巴勒斯坦民众从其家园和栖身之处被暴力残酷驱逐到邻国难民营的史实,且“揭示了以色列对历史的描述如同它在国内以及向全世界所散布的那样,充斥着曲解和偏见,

¹ See Ilan Pappé, “The Square Circle: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of Traditional Zionism,” edited by Ephraim Nimni, *The Challenge of Post-Zionism*, Zed Books, London & New York, 2003, p. 43.

^④ Ibid, p. 54.

^(四) See David Ohana, *The Last Israelis*, Tel Aviv, Am Oved (Hebrew), 1997.

以便迎合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政治论战和宣传战的需要。”¹ “新史学家”的研究和著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洞察以色列的过去、了解和分析当代以色列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客观依据。后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与其他任何民族运动相比,犹太复国主义具有更多的两面性: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场犹太人反抗压迫和迫害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从其复国计划来看,它对本土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剥削和排斥,又使它在组织和发展形式上已成为一个殖民国家。而且,正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异质性,在犹太复国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其主要动力就是掠夺和驱逐巴勒斯坦人,并利用各种时机,尽可能地控制巴勒斯坦的各种资源,从而达到建国的目的。后犹太复国主义还认为在犹太复国历史上有两个最重要的里程碑:一是 1948 年的大灾难,那时候以色列版图内的巴勒斯坦人相继沦为难民,或者说,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家园内转而成为受军事当局管制的少数民族;二是 1967 年的战争,以色列用武力征服并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剩余部分,致使其居民无家可归。基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以及以色列在建国前后一直把征服土地、市场和劳动力作为其追求的目标,后犹太复国主义得出的结论是,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殖民主义者的计划,它在道义上应受到责难,并带有先天性的弊病,这正是现今以色列面临的国内外困境的主要原因。^④与此同时,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张,以色列应选择建设一个市民社会、承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历史的论断,并从过去的黑暗中看到未来的光明。这包含了一个全面和平的巴勒斯坦,没有任何歧视的真正民主,一个能给弱势群体和遭遇不公的少数人带来希望和更加平等的社会。^(四)

(三) 对舆论宣传和国民教育的批评

后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以色列的舆论宣传和国民教育部门长期被新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把持与控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断通过与被占领土的定居者,且与以色列犹太社会中已丧失权力的阶层结盟来扩大自身的影响。新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宗教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造成以色列的教育系统退回到了用陈腐和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阐释历史与社会的地步。教育的“努力方向是在中、小学生中用新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强调犹太复国主义信条,”而且要让小学生“根据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解来学习这片土地(以色列)的历史——形成他们对未来的看法。”而且,新犹太复国主义又通过编撰有明显右翼色彩和倾向性的历史教科书向学生和其他读者灌输极端犹太复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理念。例如在以色列 50 年国庆之际,教育部为中小學生编写了一部《以色列 50 年》的历史书。这部书长达 3 卷,是一部有关以色列 1948 年建国以来的编年史著作。然而,“这本书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难民的出现无需读者追根溯源,读者只需关注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存在,也不必知道由于何种缘故使它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某个时候产生的。”^{1/4}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断言:“这种教育套路只会产生一种毕业生:种族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和极端的民族中心论者。”^{1/2}

(四) 关于全球化和以阿冲突

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同后冷战时代全球的发展、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密切相关。后犹太复国主义认为,由于以色列社会和政治中长期蕴涵的多样性,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以色列进入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就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来说,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要素是它对西方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体的剖析中,发现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作用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或削弱。这一现象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相联系,因民族国家中具有内聚性的身份认同,正在被时下强劲而

¹ Aş ad Ghanem, “Zionism, Post-Zionism and Anti-Zionism in Israel,” edited by Ephraim Ninni, *The Challenge of Post-Zionism*, Zed Books, London & New York, 2003, p. 98.

^④ See Ilan Papp, *op. cit.*, pp. 46-47.

^(四) *Ibid.*, p. 60.

^{1/4} *Ibid.*, p. 57.

^{1/2} *Ibid.*, p. 55.

广泛的全球化趋势促成的大规模变革所冲淡。全球化对种族观念浓厚的以色列的冲击导致出现后犹太复国主义。这极大地显示了犹太复国主义从单一的同种民族国家计划向更庞杂、后现代的公民性更强、自由民主程度更高的计划的转变。如果全球化变革破坏了领土、社会及其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么“自由的”后犹太复国主义趋势的出现则是对那些重大变革的回应。以色列社会的集体主义和唯意志论的精神内核将由后现代资本主义价值观所替代，从而成为一个更注重个人主义导向的、注重享乐主义的消费者社会。据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认为，这一变化进程将对和平解决以巴冲突起到一种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同时，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将逐步把以色列由一个尚武的福利社会转变为一个寻求和平和个人利益的社会。¹“和平与个人化”、“和平与利益”、“和平与繁荣”这些口号表达出一种思想，即全球化与和平存在因果联系。^④另一方面，后犹太复国主义还认为，在全球化趋势下，融入世界市场需要经济自由化，且必然会刺激政治民主化。他们据此判断，尽快结束以阿冲突，以及使以色列和中东地区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诉求，已导致以色列形成寻求和平和消除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民族歧视性质的社会力量。经济变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则在以色列催生了一个正在成长的阶层或阶级，他们的利益在于结束以阿冲突，构筑经济一体化的新中东，并促成以色列的世俗化和民主化。^⑤此外，后犹太复国主义还从流散犹太人的视角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解读，认为以色列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论战将对犹太散居者社团的民族精神、集体认同和生活方式产生有益的影响。犹太社会不应把宝贵的精力与资源奉献给以色列政府来支持它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那是一场与他们现实生活环境不相联系的遥远的冲突。这样，犹太社会就可以集中精力建设充满活力的流散犹太人的组织机构，从而为文化多元主义的制度做出决定性的贡献，而这也正是他们生存和种族延续的必要条件。^⑥

(五) 关于美以关系及对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建议

以色列同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存在一种特殊关系。从某种程度讲，以色列并非完全独立的国家，它在以阿冲突中的行动能力取决于它把本国利益与美国利益相协调的能力。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必须符合美国反恐战争的框架，就是例证。^⑦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建议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重新界定中东地区关于进步、稳定和福利的相关要素，“以色列这个被扭曲了的‘中东唯一民主国家’的自我形象确实受到美国和欧洲人的挑战”。“要从头考察犹太复国主义的复杂动机，并综合分析恐怖、野心和利益交织而成的一个复杂网络是如何左右当今以色列人的”。“西方继续把以色列当成阿拉伯蛮荒世界的一个民主堡垒的做法已成为一个障碍，它妨碍了以色列那些致力于创造为所有居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人带来福祉的人文和市民社会的人”。^⑧后犹太复国主义还主张，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共同对以色列施压。因为“无外来压力，以色列要发生变化的希望甚小。但这种压力不必采用制裁和联合抵制的形成，而应是阻止性的，以便产生一个更牢固的新的犹太复国主义思路，这是基于西方真正支持市民社会和民主社会的需要。西方必须抛弃那种根据在冷战中是否亲西方，或是在中东的背景下根据亨廷顿等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理论来判断是否具有民主的潜能这样一些标准来认同各社会的作法。”^⑨

从上述对后犹太复国主义基本主张的概括可以看出，后犹太复国主义显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和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新思潮，堪称犹太复国主义的“另类”。但总体上说，它尚无完整的思想理论

¹ See Gershon Shafir and Yoar Peled, *Being Israeli: The Dynamics of Multi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See Uri Ram, “The Promised Land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Liberal Post-Zionism in the Glocal Age”, in Gershon Shafir and Yoar Peled (eds) (2000), *The New Israel: Peace Making and Liberaliza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⑤ See Avisha Ehrlich, “Zionism, Anti-Zionism, Post-Zionism,” edited by Ephraim Nimni, *The Challenge of Post-Zionism*, Zed Books, London & New York, 2003, p. 87.

^⑥ See Ephraim Nimni, “From Galkt to T’ futsoth: Post-Zionism and the Dislocation of Jewish Diasporas”, edited by Ephraim, *The Challenge of Post-Zionism*, Zed Books, London & New York, 2003, p. 118

^⑦ See Avisha Ehrlich, op. cit., p. 95.

^⑧ Ilan Papp, op. cit., p. 62.

^⑨ Ibid, pp 61- 62

体系,一些观点和主张还没有最终定型。即便是使用或者是诋毁“后犹太复国主义”这一词语的人也对此词语的定义都持不同看法。第一个将后犹太复国主义论战介绍给以色列外部世界的犹太学者劳伦斯·塞波斯坦 (Laurence J. Silberstein) 对它做出的、并得到不少人认同的表述是:“一般来说,后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术语,它适合于当前流行的一系列批评性观点,这些观点把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及其所带来的历史叙述、社会和文化表述看做问题。像犹太复国主义这个术语一样,后犹太复国主义也包含了一系列的观点。对于不断增多使用后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很多以色列人越发觉得犹太复国主义所提供的概念和框架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对于批评家们来说,后犹太复国主义构成了对犹太复国主义基本原理和价值的挑战。对辩护者们来说,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构成了以色列变成一个完全的民主社会所必备的先决条件”。¹

后犹太复国主义的社会反响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中东局势的变化,以及以色列社会政治和文化中蕴涵的多元性,是后犹太复国主义萌生和滋长的土壤。但后犹太复国主义目前在以色列仍是一股处在缓慢发展中的新思潮,其支持者主要为犹太左翼力量和处于犹太社会边缘的阶层。因此,后犹太复国主义本身也是处于边缘状态和脆弱的,并未动摇传统和极端犹太复国主义对以色列现政府有关巴勒斯坦和以阿冲突决策的霸主地位。然而,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刚一问世,就在以色列掀起轩然大波。同时,在大学校园、学术界和教育领域围绕后犹太复国主义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怀疑、谴责、抨击、诋毁、谩骂和打压,连同鼓励、认同和赞赏等各种正、负反应都冲着后犹太复国主义涌来。这场论战甚至扩及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和美国院外游说集团。犹太复国主义右翼势力发动声势浩大的运动,对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进行强烈指责。^④以色列教育部长利摩尔·利维奈特 (Limor Livnat) 女士断然决定对以色列中学里使用的九年级历史教科书《变化的世界》发出禁令。因为她认为该课本具有后犹太复国主义性质,不适宜弘扬爱国主义,并责成各学校将所有该书的副本都用碎纸机销毁。她还强调,她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打算着手进行一项宗教性运动,以便使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退回到它应在的位置。^⑤在学术界,针对后犹太复国主义观点的各种讨伐性文章、撰稿和论著充斥以色列的传媒与报刊杂志,它们反唇相讥,抨击后犹太复国主义有意歪曲历史去迎合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一些颇具知名度和拥有极高学术地位,并一直坚持远离“非学术问题”的主流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被卷入到大论战中。这些知名专家教授虽不否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披露的“事实”与“发现”,但却质疑后犹太复国主义学者的“专业性”,攻击其研究理论与思想背景的“缺陷”。为了批驳后犹太复国主义,他们“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阐释犹太复国主义、1948年战争和建国初期的以色列,他们使用最频繁的词汇就是‘例外’。这些改良主义者声称,如果19世纪后期实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如果1948年战争犯有暴行和实施驱逐,如果建国初期出现歧视和滥用暴力的现象,那么这些都是特例而不能告诉我们规则就是如此。规则仍然保持不变——犹太复国主义从理论到行动都糅合了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⑥。

还有一些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派认为,目前以色列国内的后犹太复国主义具备以往自由主义的后犹太复国主义基本要素。它的产生不应被过多地看做由于自由主义所维护的一个广大社会阶层近期在以色列的出现,而更多的是由于社会主义集团崩溃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衰微这一背景。后犹太复国

¹ Laurence J. Silberstein, *The Post-Zionism Debat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2.

^④ See Solomon Socrates, "Israel's Academic Extremist", *Middle East Quarterly*, Fall, 2001.

^⑤ See Limor Livnat, "A World of Falsehood", *Jerusalem Post*, 19 March 2001, p. 8.

^⑥ Ilan Papp, *op. cit.*, p. 48.

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中东地区表现出具有当地特征的以色列的一个思想流派。它是弥赛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对立面，但它也与社会主义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相对立。¹ 在以阿冲突和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派也抵制和反对后犹太复国主义关于以色列“和平意愿”的增长取决于内部因素，取决于那些从以色列对外部世界开放中获益者的经济利益的判断。他们认为，和平进程是由外力强加给以色列的。而且，随着几项和平条约的签署，以色列将不会变得更加世俗和民主。相反，将会强化“种族民主”的氛围，更倚重犹太民族传统、“温和的犹太教”以及犹太人的宗教信条。^④

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观点不仅在以色列受到学术界的口诛笔伐，而且其坚持者也承受着社会的无形压力和不公正待遇。例如，曾联合签署声明并支持学生拥有拒绝为被占领土服役权利的以色列高校250名教员受当局指控犯有煽动罪，且遭到被法律制裁的威胁。后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和支持者佩普博士甚至面临被解除大学职位的窘境。其他仍未被任用的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发现他们面前的道路有重重障碍。

尽管如此，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萌生和成长，在以色列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诚如一些“中立的”犹太学者所说，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即使在以色列不占主流地位，那也将是对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主要挑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被冠以最令人振奋的“先驱”思想的称谓，并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并驾齐驱。^⑤ 他们还强调，围绕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论战具有异乎寻常的清晰度和活力，它着力解决一些相互矛盾的困难与问题，诸如回答以色列应该是一个犹太国家还是一个民主国家，以及同时寻求实现这两项目标时即刻遇到的和潜存的问题。论战削弱并公然抨击了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官方叙述提供智力和学术支持的以色列主流政治科学。同时主张把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作为以色列社会科学中和以色列社会中的一个主要过渡阶段来进行反思，而新一代研究者及学者应意识到他们对学术研究和论争的重要职责，决不能简单和不计代价地去迎合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那种老生常谈的论调，要对已确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真理”持有一种更加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并以独立、公正、均衡和超然的眼光去看待与评价犹太复国主义真理的智力作用。

事实上，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派在肆无忌惮地诋毁和攻击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观点时，它们也不得不承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以色列官方的“历史即记忆”（history-as-memory）的观点提出了论据确凿的批评，这些批评无疑动摇了为那些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公正合法解释的犹太复国主义史料编撰法的前提。同时，新史学家的“发现”及其主张对以、巴历史再界定的动议，将在当代和未来双方关系的重新定义上产生重大而直接的影响。^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的著名美籍学者爱德华·W·赛义德（Edward W. Said）对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新史学家们的评论或许更令人深思。他对佩普敢于破除旧习的才气和摩里斯等人的调查研究颇为赞赏。他批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同行对后犹太复国主义的研究方法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而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正是运用这种方法为巴勒斯坦人的穷困状况提供了严肃的证据。赛义德对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打破犹太复国主义构建的神话时所显露的博学及缜密态度表示极为钦佩。^⑦ 同时他呼吁巴勒斯坦人也有必要投入到探索其自身神话及国家理念的类似的批评性研究中。此外，赛义德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局限性。它对后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不愿意从他们自己调查研究的证据中给出结论，不愿意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巴勒斯坦的行为进行谴责表示诧异和惊愕，以至于赛义德认为摩里斯和齐维·斯顿赫尔（“Zeev Sternhell”，后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人之

¹ See Avisha Ehlidh, op. cit., p. 64.

^④ Ibid, p. 78.

^⑤ See Nira Yuval-Davis, “Conclusion: Some Thoughts on Post-Zion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Zionism Project”, edited by Ephraim Nimni, *The Challenge of Post-Zionism*, Zed Books, London & New York, 2003, p. 182.

^⑥ See Ephraim Nimni, *The Challenge of Post-Zionism*, Zed Books, London & New York, 2003, p. 6.

^⑦ See Edward J. Said, “New history, old ideas”, *Al-Ahram weekly*, 21-27 May, 1998.

一)的论著中充斥着“非常严重的、近乎精神分裂症的矛盾”¹。他号召巴勒斯坦人与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新史学家进行持续的、不懈的对话。

赛义德的看法同另一位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评论者彼得·安德森 (Peter Anderson) 的观点不谋而合。安德森认为,后犹太复国主义学术成就的出现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进步现象,他对这些杰出的智力成果表示认同,并称赞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具有的大胆无畏的研究和毫不妥协的批评风格。但他又指出,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勇气和怯懦的混合体,其中大多数人是分析问题的雄狮,而在得出结论方面则是绵羊。^④由此可见,后犹太复国主义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研究体系的缺失。

对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评价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事物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相当长的培育过程。在一个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极其强大的社会中,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新思潮能够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更需经历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检验。自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第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通过《巴塞尔纲领》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历百余年的发展。世俗犹太政治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通过与不同时期犹太复国主义各派别的无数次较量与融合,才逐渐把多数犹太人统一到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⑤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命题上,从而将犹太人引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轨道。作为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后犹太复国主义新思潮,其生命力和发展前景也需要时间的考验。但不可否认,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已对以色列政治的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它让人们清晰地听到了有别于传统和极端犹太复国主义长期把持与垄断的以色列政坛主流意识的不同声音,且开始向外部世界传播。其意义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 后犹太复国主义迫使传统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更或更加清楚地重新界定他们对以色列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念,同时对以色列政治制度的地位及其特征做出新的评价。

2. 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已发生变化,宗教弥赛亚主义式微,而且它在以色列撤出所占领土后,因失去自身存在的主要理由而将进一步衰落。极端正统派也不能为大多数人提供一种公认的生活模式,因为它是一个分裂出来的,有着强烈自我优越感的教派。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迫切需要探寻一种更适应以色列不同阶层犹太人口味的“开明的犹太教”的公共表述。

3. 后犹太复国主义首次打破了以色列学术界的长期禁忌,使后犹太复国主义成为被接受的合法话题。不仅如此,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性观点甚至得到以色列传媒的关注,并在已拍摄成的电视记录片中反映出来,^⑥从而对以色列犹太社会的“话语霸权”产生超常的潜在影响。同时它还引发了以色列教育工作者对有关历史及现状的教科书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思考。更令后犹太复国主义鼓舞的是,以色列的校园里,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细胞亦在师生身上滋长,^⑦这为后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4. 后犹太复国主义的脱颖而出及其仍处于边缘状态的事实,一方面显示了以色列犹太社会意识的多元色彩,以及它所蕴含的包容性和自由性;另一方面,它也折射出以色列犹太社会也是一个诸多矛盾的集合体,而犹太正统派在以色列主流社会占据的“霸主地位”,则预示着变更犹太国家的发展朝向和给予阿拉伯少数派平等公民权的艰难性和长期性。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Ephraim Nimni, op. cit., p. 8

^④ See Peter Anderson, “Scarying Towards Bethlehem”, *New Left Review*, second series, No. 10, July–August, 2001, pp. 22–25.

^⑤ 参见 [奥地利] 西奥多·赫茨尔著:《犹太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1页。

^⑥ Ilan Papp, op. cit., p. 56.

^⑦ Ibid, p. 59.

Israeli Political Situation in Post- Sharon Era and Its Impact on Israel- Palestine Relations

Yu Guoqing

pp. 5- 10

Israeli Prime Minister Sharon's sudden illness shocked Israeli political arena. Before he came on with the illness, Sharon had withdrawn from Likud and established the Progressive Party, which breaks up the political pattern in Israel and brings many variables to the forthcoming general elections. These new situations will further exert deep influences on future Israeli polit-

ic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as a rising force in Palestinian political arena, Hamas emerges from the Palestinian Legislative Election. Although the new leaderships of both Israel and Palestine face challenges of political innovations, Israel- Palestine peace talks may meet a new turning- point.

America's Strategic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in Iraq

Han Zhibin

pp. 16- 21

Consisting of the strategic surveys, details and pillars,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Victory in Iraq points out America's strategic advantages in Iraq, which include: U. S. - dominated democratic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in Iraq proceeds in an orderly wa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raqi army begins to take shape; and the Iraqi economy begins to recover. However, Iraqi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tructures, the authoritarian tra-

ditions in politics, the political crisis caused by colonial legaci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 S. strategic aims and result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ts global strategy and local strategy, all these are proved to be limitations of America's strategy in Iraq. Consequently, America's strategy in Iraq labeled as "victory" seems unpromising in the long - term political struggles.

A Comment on Post- Zionism

Wang Tiezheng

pp. 22- 28

Post- Zionism emerges as a new ideological trend in Jewish society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remarkable changes in world pattern and Mid- Eastern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Based on profound research done by Neo- historians on large number of archives and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ing history of Zionism to the status quo in Israel, Post- Zionism brings forth a series of viewpoints regarding many aspects as Israel's state system and the

way it intends to go. However, it has no integrated ideology, and its backers are mainly Jewish Lefts and those marginalized stratum in Jewish society. Hence, it is too weak to shake the dominance of traditional and ultra- Zionism in decision- making in current Israeli government. The values of post- Zionism lie in its potential influences on futu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Israel.